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93期(民國105年9月),135-14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李達嘉,《商人與共產革命,1919-1927》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563頁。

魏文亨*

二十世紀初是一個革命的年代,其使命及路徑的形成,實起於晚清之際。甲午一戰,國運傾危,改良與革命的步伐,就已與時俱進。維新夢破,立憲違和,改良的聲音也被革命浪潮所淹沒。辛亥功成,共和肇建,又遇袁氏當國。革命黨人欲以國會爲陣地護衛國體而不得,由此而有「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孫中山及國民黨不得不「眼光向下」,尋求國民革命的新路線。當此之時,革命話語在社會及思想層面也更加擴散。[1]及至俄國十月革命,蘇俄建立,在資本主義制度之外,世界範圍內又現一新型社會主義的政治路線。共產黨成立,國民黨改組,大革命的進程由此開始。政黨組織、主義推行、民眾動員與軍政鬥爭,成爲中國革命的主要組織形態。正是在政黨與民眾相遇之後,革命力量才具有席捲舊勢力的可能性。

革命沒有忘記商人,而商人亦難自外於革命。在「工商社會」裡,商人是具有重要地位和廣泛關聯的社會力量。但與工農、學生相比較,商人並不具有革命的「徹底性」,如何安置商人也是國共兩黨「群眾路線」中至爲敏感的環節。在中共黨史角度,通常認爲蔣介石是聯合了江浙資產階級才得以建立國民政府,在國民黨史的角度,又認爲共產黨擅長農工運動,搶奪了「群眾」。這

*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1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頁374。

一歷史公案，不同立場的解釋都各有所本，但也說明商人在國民革命中確有影響天平均衡的分量。近年關於商人群體、商人團體、「治黨史」及新革命史的研究，更注重從兩黨內部及革命過程之中來尋找變數要因，但在革命硝煙中，仍然還有大量疑問尚待解析。

李達嘉 2015 年出版的新著《商人與共產革命，1919-1927》，試圖跳出國民黨的傳統革命敘述及中共的無產階級革命觀，以實證尋求真相，重現大革命的熱血風雲，衡估各方革命參與者的行動得失。全書以革命演進為時序，從上海到廣州，再回到上海，通過三大「革命場景」和「關鍵事件」的情景式重構，系統梳理了中共的商人政策及政治行動，詮釋了中共進行商人動員的主義邏輯及政治策略，揭示出國民革命中的政黨──民眾關係及不同階層民眾的政治參與方式。全書視野宏闊，引證詳實，彌補了現有工人運動史、商人群體史在中共與商人關係研究方面的不足，在解釋民族主義與共產革命關係及還原重大歷史事件進程方面多有創見，在很大程度上顯現並提升了商人的「革命」地位及意義，為我們理解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中國革命進程及黨際關係變化提供了更為清晰的歷史圖景。

在第一部份的「上海場景」中，作者以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為中心，分三章討論中共民眾聯合陣線的形成與轉變過程，解析中共的商人動員策略。與通常認為中共係以工農動員作為民眾動員之主軸不同，作者明顯提高了商人在中共革命戰略中的地位，強調商人是聯合戰線的重要構成環節，動員商人對於中共維繫聯合戰線的完整性及影響力來說舉足輕重。中共敏銳抓住且運用民族主義來跨越階級差別，調和了無產階級革命與國民革命的內在緊張；但在聯合陣線的鬥爭手段由政治轉為經濟時，民族主義就難以彌合商界與工人間利益和理想的裂縫。

在第二部份的「廣州場景」中，作者以商團事件及省港大罷工兩大事件為中心，試圖在已有的結論之外，發掘事件背後的共產因素。作者分析，商團事件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商界懼怕聯俄容共政策，同時又怨憤苛捐重稅，故而採行

武力自衛。商人與政府的衝突體現了國共合作中的路線之爭。在商團事件後，國民黨推動中小商人組建商民協會建立與商會體系對抗，其中也有共產黨的影響存在。在省港大罷工中，中共同樣運用民族主義來聯合農工商學兵各界發動反帝運動。罷工反帝的背後，存在革命路線與領導權之爭（頁 347）。在這一部份的研究中，作者突出了中共對國民黨商人政策的影響力，也再次強調了無產階級革命與商人聯合陣線的內在衝突。

在第三部份，作者的眼光再次回到「上海場景」，事件中心則是中共上海武裝起義及清黨（「四一二」事件）。要討論的中心問題是：中共是如何聯合商人嘗試建立政權的，蔣介石是如何與「資產階級」建立同盟的，國共分裂是如何發生的。在國共黨史敘述內，對這些問題存在明顯爭議。作者的做法是依時序對兩黨與商人的關係脈絡進行對比梳理。上海武裝起義中，中共的策略是聯合市民進行反軍閥運動。「四一二」事件前，商人並沒有體現出先見之明，以虞洽卿爲代表的大商人及商會並未預聞清黨之事。作者認爲關於蔣介石與江浙資產階級早就聯合的觀點值得商榷的（頁 418）。

就筆者看來，在革命場景的時空脈絡下，作者極爲注重通過系統關聯和細節還原的方法來重構歷史現場。國民革命時期，國共關係、共產國際、列強因素，甚至工農、商人、學生等各階層態度與行動，都互相影響，而透過事件進程中的細節，可能更易發現眞相。李達嘉在分析中共與商人關係時，並沒有將其抽離出來，而是注意將其置於民眾運動整體及革命大勢之中加以討論。在關鍵事件的分析之中，作者通過周密的史料考訂，嘗試進行細節還原。在討論特別政治委員會與廣州商界關係時，對商談宴會的情況進行了描述。這一宴會背後是鮑羅廷與中共的策劃，「具有扭轉情勢的深刻用意」（頁 313）。在對商團事件中的陳廉伯，對虞洽卿、王曉籟訪問廣州等事件的分析中，人物態度及事件走向的關係得到清晰刻畫。在「四一二」的問題上，作者對國共雙方的活動脈絡進行比對，確定國共分裂及商人轉向的時間節點（頁 418）。正是通過精細的考證和描繪，各場景和事件中的政黨、階層及人物的行事邏輯和具體活

動才得到較爲完整地展示。

在場景與事件的交互分析中，作者對於「商人與共產革命」的主題思考始終貫穿。以下主要結合學界研究和作者分析，圍繞中共如何動員商人、商人在革命中的主體性及商人問題上所體現之國共關係三個問題做進一步的討論。

全書的中心議題圍繞中共如何實現對商人的政治動員展開。作者對中共的商人認識、政治主張、動員策略及內在衝突進行了全面分析。中共對商人動員的政治主張是民族主義、反軍閥，「民族主義的渲染，確實是罷工風潮迅速蔓延的重要因素。中共不但利用它來策動罷工，也利用它來凝聚群眾」（頁 142）。在動員策略上，包括輿論動員、內部分化、聯合統戰等方式，具體的做法包括聯合動員商會、動員學生對商人施加壓力、對虞洽卿等商人領袖進行統戰、組建商民協會等（頁 186、468）。民族主義、反軍閥的主張得到社會各階層的回應，中共因而將無產階級革命導入國民革命。作者的分析揭示，在國民革命時期，商人在中共的革命動員中的地位較我們原來認識的更爲重要，商人也是聯合陣線的重要環節。中共的動員政策重視鬥爭目標與組織技巧的結合，取得相當成效。但與工農群眾的動員相比，商人動員仍然有所不同。商人有民族主義的訴求，希望中國能有強有力的政權來壓制外國在華勢力，但沒有強烈的「翻身」願望，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輿論壓力下的被動參與，對革命始終抱有疑懼，並未完全站在同一陣線。中共黨組織在商人中的發展也遠比不上在工農之中的擴張。在國共分裂之際，商人轉向蔣介石集團，中共並無制約的辦法。

作者對國民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區別，有助於認識革命陣營內部的路線差異。但民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既然可以跨越黨派和階級，說明這是當時國家所面臨的當務之急。作者對此予以肯定，但又認爲中共是「利用民族主義與反帝國主義之間的模糊、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模糊、國民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模糊，對不同群體說不同的語言」（頁 22-23），在一定程度上過度擴大了中共宣傳組織的操控性。作者努力突破國共黨史的傳統革命論述，但可能因強調中共通過國民革命來推進階級革命的緣故，論說中易讓人有替國民黨

辯護的印象。中共堅持階級革命的方向，但也採取了務實的政策，重視具體的政治鬥爭目標。中共重視黨組織與社會組織、職業團體的合作溝通，與國民黨相比，中共對商人及各階層的政治心態更爲瞭解。在商人內部，商會往往爲大商人所掌控，並不能完全代表中小商人的利益。在上海總商會之外，還有著馬路商人聯合會的存在，[2]也存在著行業利益的差異。[3]共產黨將商人以左派、右派加以區分，與其內部存在著大商人與中小商人的矛盾有相契之處。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革命浪潮之中商人主體性的討論。作者在分析中注意到：商人不僅是動員的對象，也有一定的自主性，這對於理解革命之下的政黨與民眾互動關係頗有啓發。作者也正是從這個角度，清晰把握了商人在革命之中的變與不變，解釋了商人在國共之間的抉擇動機。相應而言，不易將中共的組織動員能力「神化」。新革命史的研究視野更加注重從事實與過程重構的角度來認識中共的革命歷程，[4]此與作者的視角有相合之處。就中共的民眾動員體系而言，商人動員是更爲艱難的。作者在開篇時對包括商人在內的各社會階層如何「登上政治舞臺」有所追溯，這一思路對於深入理解各階層民眾的主體性來說極爲關鍵（頁 50）。從紳商的表現來看，就會發現商人並不是政黨此時才發現的「民眾」，而是更早存在的「菁英」。在晚清商戰格局和重商政策的推動下，商人群體就不斷壯大，其社會地位也不斷提高。商人的民族主義和政治參與意識在不斷提升，其思想觀念及集體行動由在商言商向在商亦言政轉變。但其政治態度，仍呈現保守態勢。在革命與立憲之間，商人優先選擇立憲，對革命黨的活動未表達經濟支持。武昌起義之後，方被動接受。在南北對峙期間，商人態度又發生搖擺。及至二次革命之時，商會支持在政治及軍事上居於

2　李達嘉，〈上海的中小商人組織——馬路商界聯合會〉，《新史學》，卷 19 期 3（2008 年 9 月），頁 41-88；彭南生，〈上海商總聯會的形成、重組及其性質〉，《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3 期，頁 136。

3　馮筱才，《在商言商：政治變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

4　李金錚，〈向「新革命史」轉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與突破〉，《中共黨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頁 73-83。

優勢的袁世凱。袁世凱獎勵商會說，「各商界燭其奸邪，絕其資助」。[5]作爲「資產階級革命」的辛亥革命，反未得到商會的全面支持。朱英曾與歐洲做比較分析，認爲中國的商人以商業資產階級爲主，導致政治態度趨於保守。[6]

商人以商會作爲集體行動整合者，在 1905 年的抵制美貨運動中就已經展示出了強大的組織能量。[7]商會作爲商界的團體，在地方自治、經濟發展和政府財政方面有著重要影響力。商人可以通過稅收、捐資、借款及購債等方式對所認同的政治力量表示支持，也可以拒絕出資表示反對。在政治權威不足、地方秩序混亂之時，商會自建商團以武裝自衛。故此，各方力量其實對商人力量都不敢小覷。中共因素促使商人鋌而走險，但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敖光旭在對廣州商團事件的研究中提出，商人表面看來不智的激烈舉動，其實蘊含著建立「商人政府之夢」。[8]由此言之，廣州商團反抗革命政府，雖因畏懼孫中山會實行共產主義，但仍有清晰的政治意圖。作者在早年對上海商人的研究中，指明商人政治行動的目標是保護產權與秩序，這對理解商人的態度轉變有重要參照作用。[9]馮筱才此後在分析江浙商人在革命、地方變亂、民族運動中的政治行動時，也有相近的看法。[10]但問題的難點是，如果不能通過商團自衛，商人怎樣才能發現政治角逐的「最後勝者」？商人最後選擇與蔣介石同盟，組建商海商業聯合會予其以財力支持，既有對無產階級革命的疑懼，還因蔣適時表達了維護其財產與利益的承諾。更爲重要的，應與蔣在此時手握黃埔軍，具有維護秩序所必要的軍事及政治力量有關。小科布爾（Parks M. Coble, Jr.）認爲，

5 徐有朋編，《袁大總統書牘彙編》（上海：新中國圖書局，1931 年），卷 2 政令，頁 70。
6 朱英，〈清末商會與辛亥革命〉，《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 年第 5 期，頁 78-85。
7 朱英，〈清末商會與抵制美貨運動〉，《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 年第 6 期，頁 92-98。
8 敖光旭，〈「商人政府」之夢——廣東商團及「大商團主義」的歷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頁 177-248；敖光旭，〈共產國際與商團事件〉，《中國社會科學》，2003 年第 4 期，頁 175-189、208。
9 李達嘉，〈從「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關懷和抉擇，1911-191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3 冊上（1994 年 6 月），頁 237-282。
10 馮筱才，《在商言商：政治變局中的江浙商人》，頁 304。

上海資本家為恢復秩序與蔣結盟，但蔣建立政權之後，在財力上過度壓榨上海資本家又一度引發商紳反對，其中所體現商人的集體行動邏輯是一致的。[11]

最後，商人問題上所體現之國共關係的變化也是一重要議題。國共兩黨此時都在以俄為師治黨，在扶助農工、反帝反封等問題上達成共識。國民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最終指向不同，決定這一合作也只能是暫時的。至於矛盾何時激化，不是起於革命的失敗，恰是因為國民革命的成功。在對中共的商人政策進行敘述之時，作者相應對國民黨的商人政策進行勾勒，兩線並行，可以清晰展示兩黨政策之差異及成效。國民黨的商人政策受到中共的影響與策劃，民眾運動的主導權在共產黨手中。如更全面來看，在大革命初期，國共兩黨對商人革命性的看法可能有接近的地方。基於商人在辛亥革命及二次革命中的表現，孫中山對商人並沒有什麼好感。廣東革命政府建立之後，需要對商人徵稅，孫想將商團整編，都遭到了商會的反對。在商團事件中，孫和國民黨的革命話語，也是將商團與帝國主義相聯結。國民黨在初期對商人的革命意義未有充分認識，在商團事件之後，重視程度才更加提高。較之於在農工運動中的有心無力，國民黨在商民運動中的表現算是差強人意。[12]

在國共合作的框架下，國民革命才能順利進軍，在為中國政治尋找到新希望的同時，也給國共兩黨帶來了更大的發展契機和空間。兩黨都希望能夠動員民眾，壯大力量，但結果迥異。這與國共兩黨的治黨能力有著密切關係。王奇生的研究顯示，國民黨在黨員構成、組織能力、宣傳教育等方面都與中共存在差異，黨的組織力始終難以下沉至基層。[13]革命陣營內部紛爭不斷，與當時的政治文化也有關係。革命由過去一黨獨導發展為多黨並舉，各方不再以激進與保守、革命與改良來互相揚抑，而是以「革命」與「反革命」來對立相否，互

11　〔美〕小科布爾（Parks M. Coble, Jr.）著，楊希孟、武蓮珍譯，《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1927-193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 33-48。

12　馮筱才，《北伐前後的商民運動（1924-193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1）；朱英，《商民運動研究（1924-193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13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不相容，反映出革命的專斷性和任意性。[14]革命派都試圖以自身為中心建構起正當的政治文化，這在爭奪民眾的過程中體現更為明顯。與中共側重於民眾運動不同，蔣介石及國民黨右派的重心牢握軍隊。蔣介石也以此為根基，得以建政南京。大革命之後，國民黨指責中共搶奪民眾，共產黨則反思沒有建立獨立的武裝。南京國民政府因而頒布新的人民團體及社會組織的法規對民眾實施組訓，[15]共產黨則被迫轉入農村，走上土地革命與建軍之路。合作破裂，沉痛反思，兩黨的思路其實頗為相近。

千秋家國夢，革命記春秋。作者細緻鮮活的筆觸，讓我們重回革命的年代，去尋找不同政黨、階層的人的思想、行動和足跡，也發現更多的被時間沖淡的記憶和真實。國家的命運、政黨的主義、群體及個人的選擇、恩怨成敗，都在革命中交織。政黨與商人，都需要有所抉擇，有所行動。大革命雖僅數載，但氣勢恢宏，北伐大軍一掃舊軍閥的頹廢腐朽，改變了中國政治發展的方向卻為事實。作者對歷史的循環頗多感慨，只是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處於歷史歧路中的「革命者」，只能面對困境，努力尋找前行的道路。

14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一九二〇年代中國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歷史研究》，2004 年第 5 期，頁 84-105、190-191。

15 魏文亨，〈「黨規」與「國法」：國民黨民眾組訓體系中的社團制度分析〉，《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2 期，頁 110-124。